

# 杨庆堃的社会学研究及对中国社会学发展的贡献

孙庆忠

(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083)

[摘要]华裔美国社会学家杨庆堃一生致力于中国社会研究,从1930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的系统调查,到1960年代对中国宗教结构与功能的阐释,从1940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到1970年代对晚晴社会运动规律的探索,在历史的脉络中解读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其学术洞察与思想创见,不仅给后续性的研究带来了理论滋养和灵感,也彰显了中国社会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关键词]杨庆堃;社会学;中国社会

[作者简介]孙庆忠(1969—)男,辽宁省沈阳市人,中国农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乡村人类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C9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12)06-0111-06 [收稿日期]2012-09-10

杨庆堃(1911—1999),祖籍广东南海。1932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4年获该校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1939年获密执安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1948年,应邀回国到广州私立岭南大学任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1953年任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1960年代中后期,致力于香港中文大学和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合作项目,以匹兹堡大学为基地,为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的发展和第一代社会学家的成长立下了汗马功劳。香港中文大学为表彰其贡献,于1974年授予他荣誉法学博士学位。在此期间,他所积极倡导的对亚洲文化的重视、对中国社会的研究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均对美国匹兹堡大学的国际化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1979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之初,费孝通受命重建中断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学。此时,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新一代的社会学者。在教师和教材匮乏的困境之下,杨庆堃在美国积极筹措,调动资金和师资,在国外与费孝通携手重建中国社会学。

杨庆堃一生致力于对中国社会的研究:1930年代对华北地方集市系统的调查,可谓集市系统理论的雏形;1940—1950年代对乡村社区和家庭的研究,承袭了燕京学派的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以民族志的方式见证了转型时期的中国乡土社会,诠释了共产主义革命对传统家庭制度的冲击和影响;1960年代对宗教现代功能及其历史因素的研究,被视为宗教社会学的传世之作,他对中国宗教形式的

分类,将民俗生活中的各种神秘信仰与仪式纳入宗教的范畴,并阐明了其对维护传统伦理和道德秩序所具有的特殊功能;1940—1950年代对中国是否存在经济城市的验证以及对19世纪社会运动的历史考察,不仅表现出了他对中国社会的深刻洞察,更显示出了中国社会学研究对世界社会学理论的独特贡献。

## 一、周期性市场:中国乡村经济生活的循环方式

1931年夏,杨庆堃跟随杨开道教授到山东邹平作农村社会观察,意外地被县城东关外的市集所吸引,此后,市集对农村社会的功能便成为他探索的主题之一。1932年,在来燕京大学讲学的派克教授的鼓励下,这一研究得以在人文区位学的理论视角下延续。1933年3月中旬,他再次到邹平仍以城关集以及附近的明家集和刘聚桥集作中心,花了六个星期的工夫做了较深入的研究<sup>[1](P7-9)</sup>。1944年,《华北地方市场经济》一书由美国太平洋关系学会出版。在这部著作中,杨庆堃将邹平的市场系统分为基层市场、中间市场和中心市场三种基本类型,并从贸易区域、内部组织、交通运输、集期安排与商人流动等多个侧面,描述了以赶集为中心的中国乡村经济生活模式。这个经济交换圈是一个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区域,构成了一种自给自足的社会单位。但它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拥有铁路便利的重要商业中心即在其附近。因此,“在机械运输发挥重要作用的

同时,广泛的区域间货物交换已经发展了。来自中心地区的机械产品已深深地袭入地方的经济生活,现代经济正渐渐地取代旧的经济。但是,这些新的经济动力只有依赖不可或缺的集市系统,才能建立起与当地经济的联系。”<sup>[2] (P37)</sup>

布鲁默在《华北地方市场经济》序言中认为,杨庆堃对集市三种类型的划分,勾勒出了从原始的民间经济到复杂的工业化城市经济的转换路径,而他对市场类型的细致分析则为这种普遍化的转换过程提供了具体的信息。这项重要研究成果,填补了中国本土经济领域认识中的一项空白,也为西方学者学习中国乡村生活知识提供了一个丰富而重要的来源。杨庆堃调查邹平集市系统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探讨周期性集市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角色。他的研究发现,定期集市不仅仅是一个严格履行经济功能的场所,还是一个实现各种社会功能的重要场域,信息和思想由此传播到周围的村庄。集市实际上成为调剂农民单调乏味的生活,使之了解村外世界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期性市场可以被视为一个集体机制,通过这个机制推动了群体行动和社会变迁<sup>[2] (P11-13)</sup>。这一发现为后来学者的扩展性研究带来了灵感。如施坚雅通过对四川市场交易系统的研究认为,农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不是村庄,而是由十几个村庄组成的“基层市场社区”。这一区域的边界决定了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sup>[3] (P40)</sup>。如果将中国台湾祭祀圈与杨庆堃、施坚雅所描述的中国大陆乡村市场交易体系相比较,两者的相似点是明显的,祭祀圈的特征几乎在乡村市场交易体系中都出现了<sup>[4]</sup>。

尤为值得提及的是,在这项经典的研究中,杨庆堃还专门指出了市集系统研究与中国战后重建问题的联系<sup>[2] (P39-41)</sup>。抗日战争时期,处于日军占领下的邹平,集市仍然在当地经济整合中发挥着重要的功能。日军在邹平四周建立了基于扩张需要的现代交通主要用于军事目的,但并未改变集市系统赖以生的基础。而战后重建和中国工业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是:聚集在市场周围的经济“细胞”仍然作为当地经济的基本单位时,通过劳动力的地区流动而形成的高效农业和工业生产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他的研究数据充分说明了邹平因缺乏流动而经济孤立的主要因素——代价高昂的原始交通手段。除此之外,对地方集市系统的研究也为当地社区的重建提供了有力证据。1933年,邹平县国民政府修订县内管理区域时,便从杨庆堃的研究数据中获得了重要依据。民众在市集的定期聚集,使市场成为超越

村落的社区活动和组织的中心,一个市场的交换领域不仅代表一个经济单位,也是一个社会单位。这种判断既是杨庆堃对地方社区经济整合功能的认识,也是他研究中国社会中宗教功能的理论先声。

## 二、村庄与家庭: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社会

《向共产主义转化前期的中国村落》<sup>[5]</sup>,是杨庆堃在岭南大学任教期间根据对近郊乡村社区调查完成的村庄民族志。这部著作承袭了燕京学派的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方法,全面而细致地记录了南景这个城市边缘乡村社区的文化形貌,内容涉及人口结构、土地利用、生产消费、亲属制度、权力结构、阶级的稳定性和流动性以及新政权的建立、土地改革、乡村经济与文化娱乐的变迁、《婚姻法》为乡村社会带来的“家庭革命”等诸多方面。

在这部著作的“前言”中,杨庆堃说明此项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制度体系和村庄组织的变迁。共产主义革命带来了乡村社会的转型:1949年10月广州解放,解放军进驻南景村,开始了摧毁原有政治权力的工作。保甲制度、地主武装被废除;自卫队组织被缴械,狮会自行解散;宗族的枪支被收缴,族产被没收。与这些权力组织瓦解的同时,诞生了新的组织机构——村政府和农民协会。1951年春,村里又成立了青年团和妇联的分支机构。他们的工作以宣传为主,主持各种会议,组织各种文艺汇演,出墙报,贴标语,以多种形式向村民灌输政治理念,传播新的社会意识形态。可以说,从1951年“镇压反革命”到之后的历次运动,他们都是社区的先锋。这些新的组织机构将国家意识形态无孔不入地渗入到乡村社区的生活之中。事实上,村民的全部生活已经被整合到国家的权力之中。杨著的重要价值在于,描述了共产主义运动前一个中国村庄的生活模式和之后锐变中的乡村生活,再现了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后历史性的变迁过程。时至今日,他的这部著作仍然是从村落的微观视角来展示中国社会剧变的一部精当的民族志报告。在与中国大陆断绝联系长达三十年的西方世界,它一直是学者们研究中国近现代社会的重要文献。对今天的中国社会人类学实践仍然具有极高的借鉴意义,对社会史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与村落社区的研究相互印证,《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庭》<sup>[6]</sup>一书则集中展现了共产主义革命如何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家庭结构,如何影响了中国人的婚姻观念及家庭成员的内部行为。在中国传统

社会,家庭首先是一个经济组织,生产和消费是其首要功能。此外,家庭还是一个提供教育、维护社会秩序的基本组织,并且,还是重要的宗教组织,祭祖是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具有维系道德和保持家族认同的功能。由此可见,家庭制度是中国社会稳定的基础,是传统社会中政治制度、教育制度和宗教制度赖以依存的核心。因此,有关家庭制度的变革,始终是那些关注传统社会如何现代化的社会科学家所探讨的焦点之一。杨庆堃对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家庭的研究是最具影响力的探讨共产主义中国的婚姻和家庭的著作,其得出的有关重要结论还掀起了1980年代初学者对该问题展开的第二次研究热潮。

从学术传承上看,杨庆堃深受帕森斯和费正清思想的影响,强调以西方为先导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中国传统社会稳定的家庭结构。尊、卑、长、幼这些曾经使中国家庭结构稳定的核心元素,在遭遇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文明模式后受到质疑,以牺牲个人幸福和自我实现为代价的稳定的中国传统家庭结构,在西方文化观念的强势渗透和影响下,失去了原有的平衡状态。这是杨庆堃分析中国家庭制度变迁的理论基点。承此,他认为中国家庭模式的转变早在大陆兴起共产主义运动之前便初露端倪。20世纪初期,一些受过现代教育而身处传统家庭和社会强大压力之下的青年男女,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纷纷通过抗争来摆脱传统的家庭制度。之后,随着受西方思想和文明影响的年轻人数量的增多,传统家庭对年轻人的实际控制力逐渐缩小。可以说,接受现代教育是参加家庭革命的先决条件,而这种教育只有在城市里才能获得。究其原因在于,“城市因为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流动性,比起农村社区来说,更是一方传播与传统家庭的专制特点不相容的现代民主观念的沃土”<sup>[6] (P17)</sup>。回首百年来的中国,从上世纪初期的自由恋爱,经民国时期的家庭改革,家庭组织的功能愈来愈被削弱,结果退守到一个次要地位<sup>[7] (P52)</sup>。由此可见,中国家庭革命的起源先于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在杨庆堃看来,1950年5月1日新中国首部《婚姻法》的颁布,是在国家法律保护的前提下扩大了此前“家庭革命”的影响。在南景村,我们看到了《婚姻法》带给家庭结构的戏剧性变化:父母包办婚姻不再合法,以年龄、性别为基础形成的社会地位受到挑战,宗族长老的权威彻底崩溃瓦解。这就是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结果。

1982年,杨庆堃重访广州南景村,并寄希望于他竭尽全力支援复办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以社区研究为方向,完成中国农村与家庭的续编。此时的南

景村正处于城市化的进程中,从家庭到村落,从生产到消费,都在经济发展的牵动下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这是中国社会继1949年政治革命带动社会转型之后,以经济变革带动社会转型的又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从1984年到1992年,中山大学社会学系分别从农民家庭构成和家庭消费、城郊人口的社会流动、村庄的社会分化、郊区的城市化进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运作等主题入手,描述和分析了向都市演进过程中的社区生活<sup>[8]</sup>。这一时期,珠江三角洲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都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承此机缘,人类学者也通过对南景村的深入调查阐释了乡村都市化的发展前景与社会问题<sup>[9] [10]</sup>。这些后续性研究,不仅呈现了城郊社区发展的动态图景,也使杨著拥有了跨越时空界限,全面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解释性价值。

### 三、结构与功能: 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

中国社会深受理性主义儒家的影响,不重视宗教,凡事从现实着想,仅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这一传统不仅开了古代无神论的先河,还在近代西方文明的优势下成为一些中国学者否定宗教合理存在的主要依据。在杨庆堃之前,中国是否存在宗教,始终没有定论。基于对宗教在传统中国社会中地位问题的思考,他对中国宗教研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中国的社会生活和组织中,宗教发挥了怎样的功能,从而成为社会生活和组织发展的基础,而这些功能又是通过怎样的结构形式来实现的?其目的是对一些重要的事实作出功能性解释,以便展示宗教和社会秩序的关系模式。为此,他以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来解析中国社会,将宗教分成两种结构形态,即制度性宗教与分散性宗教。制度性宗教自身拥有神学或宇宙和人事的解释系统,拥有独特的象征和崇拜仪式,并且有一个独立的人事组织去促成神学观点的阐释和祭祀活动的进行。从结构学的角度看,制度性宗教的最大特点在于可以独立于世俗的社会体系之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与之相分离。分散性宗教也有其神学、祭祀与人事的运作系统,但无论其精神内核还是形式化的仪轨组织,均与世俗制度和社会秩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总之,制度性宗教作为分离出来的世俗宗教系统,其自身独立地发挥作用,而分散性宗教则只能依托世俗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发挥其功能。因此,前者在基层社会组织中的渗透力及示范意义相对较弱,后者则无法独立于社会基层网络,而是作为社会秩序的支撑力量运作于世俗生活之中<sup>[11] (Chap12)</sup>。

儒家是不是宗教,历来争议颇多。杨庆堃认为,尽管关注现实人生是孔子最重要的目标,但在他尊敬神灵的劝诫中、对祭祀的强调以及对天对命的态度中,始终承认超自然力量的存在。这恰恰是中国宗教的本质特色:虽不合乎西方传统宗教的界定,但独特的信仰方式表现了对超越与终极的关怀。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又不能将儒家视为成熟的宗教,因为其基本原则主要是从实用考虑,即便是新儒家的佛教思想也不能改变其基本的现世倾向。它虽专注于生与死的终极意义,但所依据的是人的道德责任,而不是任何超自然的力量。在中国宗教的两种结构形态中,宗教与道德相互渗透、相互支持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分散性宗教中,国家的祭天大典,其道德和社会意义由儒家来制定。祭祖的神学理论是作为支持儒家所设计的亲属团体的道德而引申出来的。制度性宗教如佛教、道教等,它们虽有各自的道德系统,但仅被教内的僧侣和虔诚的信徒所奉行。就普通的民众而言,他们可能受多种宗教的影响,在接纳儒家道德的同时,又要去拜佛,去请道士作法,以裨益于身体或魂魄。而尤为重要的事实是,孝顺为道教的十德之首,亦为佛教所张扬。这足以说明儒家的道德系统与中国宗教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性<sup>[12] (P334—335)</sup>。而宗教在发展中与世俗制度的这种融合,在客观上削弱了具有独立功能和结构的宗教组织形成与完善的可能性。

杨庆堃对中国宗教的研究,关注点是19世纪至20世纪现代变迁时期的中国社会。此时社会生活的商业化、理性化以及世俗化的结果必然是神圣范畴的萎缩和对信仰的质疑。而尤为显著的世俗化倾向,不仅削弱了宗教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影响,也打破了神圣观念带给社会的安定,同时也使知识分子的观念发生了彻底转变,但这并未改变宗教在民众生活中产生的持续性影响。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有神论的宗教转换成了对国家的忠诚,无神论的共产主义成为一种新的信仰。中国共产党对宗教的政策和处理方式以及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只是使民众的宗教活动和信仰心理由显性变为隐性,却无法使之彻底根除。“在这种情况下,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若仍想保持社会的政治信仰地位,它就需要对有神论的宗教持宽容的态度。惟其如此,有神论才能发挥其特有的道德功用,以稳定新的社会秩序。在人们对政治正统普遍质疑的情况下,复现的神明会发挥它惯常的作用。就像有神论宗教与儒教长期发生摩擦共存一样,儒家思想的广泛性也在客观上促进了有神论信仰的发展。”<sup>[10] (P404)</sup>这是杨庆堃对中

国宗教的预见。实行改革开放后,在中国大陆各种宗教活动的复兴便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其内容与形式因时代的不同而发生了诸多变异,但中国社会中宗教的结构和功能却相续依旧。中外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宗教研究,也在客观上印证了杨著的学术意义和现实价值。

#### 四、社会变革的动力: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探索

从1960年代开始,为了对现代化背景下中国社会进行了解,杨庆堃筹划了两项历史社会学研究:其一,以佛山镇为个案,再现传统中国城市变迁的历史过程,以期回应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只有行政中心的政府都会,而没有欧洲经济城市的论断<sup>[4]</sup>。其二,在历史文献中寻找现代社会运动的规律,探寻中国社会变革的动力。这两项研究对于理解中国城市早期资本主义的运作形态以及20世纪的中国革命,均具有重要的启示性价值。

从19世纪开始,中国进入内忧外患的时代。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风起云涌,这些寻求社会变革的集体行动,表达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也预示了中国社会深刻的制度变革。作为现代社会变迁的具体动力,社会运动研究不仅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根源,也有益于把握新社会秩序的性质和方向。基于此,杨庆堃于1965年筹划了“中国19世纪的社会运动研究”计划。此项研究以《大清皇帝实录》为原始资料,从中抽出动乱事件的记载以及相关的政治、经济材料,对晚清从嘉庆到宣统等六朝共116年间(1796—1911)的社会资料进行系统的定量研究<sup>[13] (P174—210)</sup>。据统计,19世纪有0.6万余宗大规模集体行为,1.8万多次天灾,用3万多次惩罚官吏及100多万件朝廷奖励来维持传统价值。具体分析这0.6万余宗大规模集体行为可知:在116年间集体事件共6612宗,平均每年57宗。就其种类而言,有一半和政府军队有关,盗贼占1/4,秘密会党的聚集、暴动、抗粮、教案、示威、罢工罢市、恐慌惊遁等事件占1/4,这种结果显示出政治和社会秩序出现了严重问题。从地理分布考察,这些社会运动分布于全国各地,尤以中原腹地居多,而且集中于政治敏感的大中城市,凸显了政治制度为变革的焦点。从领袖人物的身份来看,在已知的1867人中,上层的占59%,中层的占8%,下层的占33%,由此可见全社会对传统政治秩序普遍不满的心态。

与民众大规模社会运动相应的是统治阶级对传统社会价值的褒奖。在所分析的6000余宗大规模集体行为中,有明显政治目的者4800宗,其中,要求

改朝换代的接近 2000 宗,要推翻专制政治体制、主张革命和抵抗政府军事镇压的各占 1200 余宗,其余的 300 余宗是支持政府的。由于大部分集体行为具有反政治体制的目标,其社会价值取向自然地充满了反传统的色彩。为了维护统治秩序,面对严重的内部叛乱,晚清政府采取了两种应对模式:一是军事镇压。在统计的 6000 余宗社会运动中,有 2/3 是朝廷派军队镇压的,只有 1/4 是用行政措施解决的;二是大力奖励有助于秩序恢复的正统价值。举凡忠孝贞节这些中国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百余年间受到皇帝颁布的奖赏多达 200 万件。社会运动与社会核心价值系统的内在关联,由是可观之。

对 19 世纪社会运动的实证研究发现:第一,在西方文化和文明的冲击下,清朝官吏的贪腐无能更加突出,民众也因此对传统的政治制度丧失信心,加上实质的生活受到威胁,终于激发起广泛的群众运动,预示着革命世纪即将来临;第二,社会运动的主流具有反传统的价值取向,其目的是摧毁传统的政治秩序,反映了人民群众摒弃传统文化希望从外来思想中寻找现代化道路的愿望;第三,19 世纪的社会运动组织有三大类型:秘密社会策动的占 26%;少数民族策动的占 33%;太平天国和国民革命团体策动的占 38%;其余少数则是由家族和职业群体所策动。从组织上看,大半事件属于传统的组织模式,但现代组织模式尤其是意识形态群体正在抬头,这种组织模式的转变是了解 20 世纪中国社会变迁的重要线索<sup>[7] (P153)</sup>。正是基于对中国社会动荡的定量描述和分析,杨庆堃在国家层面探索了制度领域的复杂社会过程。可以说,统治阶级内部长达一个世纪的混乱,才导致了 1911 年的国民革命和 1949 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带来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根本转变。

## 五、中国社会研究之于社会学的潜在价值

早在 1930 年代,社会学家吴文藻便提出借鉴功能派的观点和方法,实现社会学中国化的思想,意在基于中国的事实,建立中国社会学理论<sup>[14] (P4)</sup>。可以说,杨庆堃一生持之以恒地对中国社会的研究,正是他自觉践行社会学中国化这一学术主张的研究典范。

作为一位具有世界性学术视野的社会学家,杨庆堃 1932—1933 年对山东邹平市集的研究,描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北方农村集市的市场圈,并提出了集市体系理论。他对贸易半径和市场层级的分类,为后续研究提供了分析样本和认识乡村社会结构的

视角,并在三十年后被美国人类学家施坚雅视为“第一流的”、“开拓性的”实地研究<sup>[3] (P56)</sup>。他坚信实地调查和社区研究是社会学研究者的主要工作。1948—1951 年对广州南景村的调查,是杨庆堃社区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实验。他认为,家庭和乡村是了解中国传统社会现象及特点的基点,也是把握社会变革脉动的基本要素。透过家庭与村庄在革命下的变迁图景,可以看到 20 世纪中国现代转型给传统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所造成的深刻影响。正如帕森斯在为杨著所作的序言所言,这项研究的价值在于超越了众多关于中国家庭的“静态”分析,以他的一套关于中国家庭平衡条件的动态分析的结构形式,不仅联系本土,也与其他的社会结构相联系起来<sup>[6] (P6)</sup>。杨庆堃的研究在改变西方世界的中国观念的同时,更把目光直指中国社会的特性,以期检验并修正西方社会学理论。如他对中国官僚行为的研究<sup>[15] (P134—164)</sup>,意在系统地考察中国科层体系的主要特征,建立一个经验主义的模型,从而在总体上阐明科层体系的基本性质。在韦伯的理论建构中,科层体系包含四个基本特征:有专业化的功能,拥有责权层次,正式的规范或制度以及非人性化。在实现组织目标时,上述因素的聚合使之在效率和可预见性方面具有了高度的理性化特质。然而,科层体系的理性特征却由于中国社会系统的价值观和功能要求而被调整,具有地方同质而国家异质,强调初级群体和密切的人际关系,强调非正式道德秩序的重要性等特征,从而背离了科层结构的理性要求。杨庆堃对官僚行为的历史考察,可以说是对西方社会学科层制理论的重要修正。这种研究取向和方法,在其中国宗教的研究中得到了更加纯熟的展现。因此,雷德菲尔德把杨庆堃视为“功能分析中国宗教之第一人”,弗里德曼把杨氏的著作放进韦伯和葛兰言的社会学传统之中,认为“社会学传统在此达到了一个高峰,他使中国宗教成为一个实体”<sup>[16]</sup>。

杨庆堃熟悉西方理论,更对中国历史文献资料运用自如。这种深厚的学术功力几乎熔铸于他的每一项研究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历史社会学家。从 1940 年代后期所作的关于中国社会变迁中的时空压缩研究<sup>[17]</sup>,到 1960 年代中期从时间和空间角度对清末民变规律的探索,在历史的脉络中解读社会秩序的构成、解体与变迁,是他研究中国社会的基本理路。1970 年代末、1980 年代初,他对中国社会学重建作出的卓越贡献,是其探寻中国社会发展之路的努力,是其治学原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学要深入研究社会问题,更要为中国的现代化

服务。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学作为世界社会学的一部分,不仅通过知识建构和面向现实展示独特的中国,还要在全球化时代汲取有造诣的社会学知识。杨庆堃的学术思想是在西方社会学观照下中国本土化研究的理论成果,因此,在与西方学界进行交流中,他所展现的是中国社会研究的独特价值——“社会学理论缺少中国的类型就不完全。如果中国社会研究的事例,可以加入社会学理论,成为它的一部分,使世界的社会学,从概念、理论到方法,有普遍性,这就是中国事例的贡献。所以社会学能够真正在中国生根发展,不但对中国有益,对于全世界的社会学理论,也是有帮助的。”<sup>[7] (P13)</sup> 这是杨庆堃留给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笔重要遗产,也是后辈学者立足中国现实,致力于研究现代社会变迁理论的精神动力。

#### [参考文献]

- [1]杨庆堃. 邹平市集之研究[D]. 北平: 燕京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硕士论文, 1934.
- [2]Yang, C. K. 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 New York: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1944.
- [3]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8.
- [4]许倬云. 杨庆堃先生的治学生涯, 1911—1999[J]. 汉学研究通讯, 2001(3).
- [5]Yang, C. K.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59.
- [6]Yang, C. K. The Chinese Family in the Communist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The M. I. T Press, 1959.
- [7]刘创楚, 杨庆堃. 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M].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9.
- [8]何肇发. 珠江三角洲集镇与农民[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1991.
- [9]孙庆忠. 边缘性社区的宗族生活——广州南景村个案追踪研究[J]. 岭南学报, 2000(2).
- [10]周大鸣, 高崇. 城乡结合部社区研究: 广州南景村 50 年的变迁[J]. 社会学研究, 2001(4).
- [11]Yang, C. K. Religion in Chinese Society: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Social Functions of Religion and Some of Their Historical Factor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1.
- [12]杨庆堃. 儒家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A]. 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C]. 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79.
- [13]Yang, C. K. Some preliminary Statistical Patterns of Mass Actions in Nineteen - Century China.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Carolyn Grant( ed. ), Conflict and Control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5.
- [14]吴文藻. 论社会学中国化[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15]Yang, C. K. Som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Bureaucratic Behavior. //D. S. Nivison and A. F. Wright ( ed. ), Confucianism in Ac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 [16]金耀基, 范丽珠. 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J]. 社会, 2007(1).
- [17]杨庆堃. 中国近代空间距离之缩短[J]. 岭南大学学报, 1950(1).

## C. K. Yang and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SUN Qing - zhong

(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 China)

**Abstract:** This review essay aims to highlight Prof. Yang Ching - Kun's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society. As a sociologist, the study of China and building of an authentic Chinese Sociology were the center of his intellectual commitments. His representative studies of four major institu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his studies of the market in the 1930's, the family and community studies in the 1940's and 1950's, his analysis of religion in the 1960's, and research on the source of modern change in 19th - century Chines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60's and 1970's. His sociological theory will inspire future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of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C. K. Yang; Sociology; Chinese Society

[责任编辑、校对: 王维国]